



四川佛寺壁画艺术

SICHUAN FOSI BIHUA YISHU



曾繁森◎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Sichuan Fosi Bihua Yishu

四川佛寺 壁画艺术

曾繁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佛寺壁画艺术 / 曾繁森著. — 成都: 四川
美术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10-6505-7

I. ①四… II. ①曾… III. ①寺庙壁画—介绍—
四川省 IV. ①K87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3244号

四川佛寺壁画艺术



SICHUAN FOSI BIHUA YISHU 曾繁森 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宋 旻 陈 玲
责任校对	黄 娇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4.5
字 数	160千
制 版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6505-7
定 价	1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佛寺壁画是绘制于佛教寺院建筑物壁的绘画作品。佛寺壁画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大约1世纪，随佛教以及佛画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佛寺壁画。早期的佛寺壁画有着外来的影响，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走上中国化的进程，佛寺壁画也成为我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有的历史时期成为绘画的主流。

佛寺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佛像、佛图两大类。佛像包括佛、菩萨、罗汉、诸天鬼神、高僧像等；佛图包括佛本生、佛传、经变、水陆画等。在中晚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现实社会生活的人物形象、山水、花鸟以及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等等也成为佛寺壁画表现的题材。其中，隋唐时期经变画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佛寺壁画的极高成就。它是中国佛教绘画艺术的一项创造，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技巧和样式的发展，摆脱了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范围与限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佛教绘画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与创造新的形象的天地。

佛寺壁画从汉时期的发生到唐的鼎盛，经宋、元、明的延续起伏，到清末、民国的衰亡，从而走完它的历史进程。

四川佛寺壁画的发展进程与全国大体一致，但也有着一定历史时期进程、题材内容的倾向性、规模等差异和相对独具特色的地方。

四川佛寺壁画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中晚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四川佛寺壁画的兴盛时期。在中晚唐之前，鲜有四川佛寺壁画的史料记载。中晚唐之后，大量京都、中原的画家先后两次随唐帝避乱入蜀，成为四川佛寺壁画兴起和繁盛的主要原因。他们是四川佛寺壁画绘制创作的主体，并带来大批壁画范样、粉本，可以说在四川佛寺壁画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佛寺壁画成为他们竞技的最好场所。他们在蜀地教授弟子，影响蜀地画家。这一时期壁画题材基本是京都佛寺壁画的复制、仿绘，以佛、菩萨、罗汉、诸天、高僧等佛教人物形象和佛本生、佛传、经变故事等为主。其中经变画的盛行体现了这一时期佛寺壁画的最高艺术水平。

第二个时期为五代两蜀时期，也是四川佛寺壁画延续唐风、继续繁荣的时期。这

一时期历史不长，但由于统治者对绘画的重视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宫廷画院，画家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大批蜀地画家崛起。这一时期佛寺壁画题材延续佛教人物、经变等题材，其中罗汉壁画盛行。另外，代之而起的是现实人物逐渐成为主体，帝王将相写真等占据画壁。如宋艺在成都大圣慈寺壁绘《大唐二十一帝圣容》，阮知海画少主、先祖像，张玫画文武臣僚群像，李文才画诸亲王文武臣僚像等。此外，山水、花鸟壁画亦有发展，佛寺壁画更加走向世俗化。

第三个时期为宋元时期。这一时期是四川佛寺壁画走向衰微的时期。北宋还在延续晚唐、两蜀的遗风，而到南宋至元，蜀地佛寺壁画走向消沉。在北宋时期，由于远离中央政权，画家的创作脱离皇室的控制，加之社会上文人画思潮的泛起，这一时期蜀地佛寺壁画的题材逐渐向山水、花鸟方向发展，并成为主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佛寺壁画题材多样化，表现手法也新颖多姿，但有悖佛寺应有的法相庄严，偏离佛教壁画的宗教性质和弘法功能，而到南宋、元时期走向消沉。

第四个时期为明代。这一时期应为四川佛寺壁画继中晚唐、五代两蜀之后，又一个繁盛时期，是夕阳西下前的一抹灿烂的彩霞。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有壁画绘制记载的佛寺就有数十处，有部分至今遗存或残存，其社会历史价值及艺术水平不亚于国内其他地区。

这一时期的佛寺壁画题材内容可能为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几乎完全回归宗教题材，但区别于前代和国内其他地区，蜀地佛寺壁画的题材突出十二圆觉菩萨、诸天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成为蜀地佛寺壁画的主要题材，而与国内其他地区佛寺壁画相比较，又以表现十二圆觉题材的佛寺壁画众多为其显著特征。另外，佛传故事作为传统佛寺壁画题材，明代国内描绘的佛寺比较多，但蜀地剑阁觉苑寺的佛传图又因其全面系统、构图宏大和绘画水平精湛，以及保存比较完好而独树一帜。

宋元以来，由于文人画的兴起，士大夫画家追求意趣的写意而屑于工巧，这一时期佛寺壁画的作者基本都为民间画师。

第五个时期为清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四川佛寺壁画走向衰亡的时期。这一时期，佛道儒合流，一些佛寺内，儒家、道家、民间信仰之神登堂入室，壁画题材内容杂陈，有佛教、神话仙道、福禄寿、二十四孝、民间戏曲、历史故事等等，大多画幅窄小，少有鸿篇巨制。表现手法上也是多种多样，有工笔彩绘、工兼写、写意作色、水墨

等等，绘画水平参差不齐，少有较高水平的作品，画风柔弱是其主要特征。这一时期佛寺壁画的作者有民间画师，也有当地好画人士加入，也有个别文人画家及画僧的参与。

佛寺壁画属于宗教艺术范畴，它是宗教观念与艺术形式的结合，是宗教情感的艺术表达，是赋有艺术美外形的宗教精神。它或者表现宗教的题材内容，或者虽然以世俗生活为题材，但却表达了某种宗教的观念或情感。

佛寺壁画是佛教引发信仰、扩大宣传的一种重要工具。它可以形象直观地传播佛经教义，为善男信女提供祭祠敬奉的对象，并为寺院殿堂带来法相之庄严，可以说佛寺壁画为弘扬佛法的第一方便。《贤劫经·四事品》中说：“作佛形象坐莲华上，若摸画壁增氎布上，使端正好，令众欢喜，由得道福。”《贤愚经·阿输迦施土品》还具体说，释迦牟尼过去世中，曾请人画八万四千如来像，分送各国，令人供养。由于这样的功德，生后形象端正殊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并且自致成佛，涅槃之后，还当得八万四千堵塔果报。由于佛经宣讲画佛可获得功德，求得果报，还可成佛，这种明确的许诺和直接的鼓励，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激发起广大民众的宗教热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数的画家、画师们在昏暗的油灯下，长年累月、呕心沥血地在佛寺殿堂墙面上作画，广大的百姓则慷慨解囊捐钱、施物，以供养佛、菩萨。

据史料记载，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瓦官寺初置时，闭户一月余，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从这一记史事，就可见一斑。它一方面说明了广大善男信女的宗教热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画家佛寺壁画的高超技艺和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正如谢灵运在《佛影铭序》中所说：“岂为象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佛寺壁画充分发挥艺术的职能，对于信仰者做到了能“传心”，能把信仰情绪推到意想不到的极致。

宗教是人类早期出于对大自然的畏惧与依赖而产生的，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必要步骤。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53页）当人的因素更加被“异化”的情况下，宗教价值便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创造力的价值调节器，是人类的精神鸦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神权的退位和人性的复归，当人的因素更多地被确证的情况下，这种价值便代表了对苦难的抗议或对美好理想的导引。

宗教绘画是宗教宣传品，是为宗教服务的，但是宗教绘画的观赏者是以广大群众为



对象的。因此，宗教绘画在既不离仪轨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以满足和表达广大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愉悦和审美需求，反映他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同时，这些宗教绘画的作者，不管是文人士大夫画家，还是广大的民间画师，都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不同人群，他们与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是契合的。因而，众多宗教绘画作品又是广大群众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的宗教产物。蕴含在宗教绘画中的现实因素，以及良好的愿望和审美情感，往往使众多宗教绘画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回忆、认识和美的感受。

我们在观赏历史为我们遗存下来的宗教艺术作品时，感受到的是那些通过艺术形象积淀着的历史和人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和抛弃了这些宗教艺术作品中包含的宗教观念，庄严肃穆的本尊大佛，可能成了一个胸怀宽广、博大精深的智者；妙相庄严的菩萨，则犹如一个个婉丽多姿、纯真脱俗的女性；锁眉瞪眼、手持法器的天王、力士就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将军；而那众多的罗汉形象，更是社会生活中形貌各异的人物群像。

宗教艺术不仅仅是宗教思想的物化形象或形象化，它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所指对象，往往大大地超越它自身。

作为宗教艺术的佛寺壁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术交流，师资传授，在技法经验、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综合形成了优秀而又深厚的艺术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和借鉴的珍贵的艺术遗产。

佛寺壁画是属于不易保存的艺术作品。由于附着于佛教寺院建筑物面上，历史上兵火战乱、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容易被损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建筑不存，壁画也随之不存。而有的佛寺建筑尚存，壁画由于疏于维护，甚至被人为破坏，一些佛寺壁画也就遭到灭顶之灾。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佛寺壁画大多是明清以来的遗存，而宋元遗存已是凤毛麟角，隋唐五代已基本绝迹。我们今天所能观赏到的佛寺壁画，可能几年、几十年乃至百年之后，除少数能得到重点保护的以外，是否还能存在，将是一个难说的话题。

本书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比较全面、系统的以论述结合和相应丰富的图片资料介绍了四川蜀地各个历史时期的佛寺壁画，使广大读者能关注、认识和了解前人为我们创造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就是本书的目的。

作者

2015年5月23日于成都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早期在四川地区的传流及佛寺壁画的出现 / 001

壹】 概 述 / 002

贰】 佛教早期在四川地区的传流及佛寺壁画的出现 / 009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佛寺壁画 / 017

壹】 概 述 / 018

贰】 隋唐时期的佛寺壁画 / 026

成都福胜祠壁画	成都大石寺壁画	成都静德精舍壁画
射洪惠普寺壁画	南部罗寂寺壁画	成都大圣慈寺壁画
成都圣寿寺壁画	成都净众寺壁画	成都圣兴寺壁画
成都中兴寺壁画	成都建元寺壁画	成都应天寺壁画
成都梵安寺壁画	成都龙兴寺壁画	三台琴泉寺壁画

叁】 隋唐时期的佛寺壁画画家 / 042

展子虔	僧元畅	薛 稷	吴道子	卢楞伽	辛 澄
李洪度	左 全	赵公祐	赵温奇	张 腾	范 琼
陈 皓	彭 坚	陈 洗	常 粲	吕 晓	竹 度
张 询	滕昌祐	孙 位	张南本	常重胤	僧楚安
赵德齐	张 立	麻居礼	刁光胤	张 蓬	

第三章 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的佛寺壁画 / 065

壹】 概 述 / 066

贰】 五代前后蜀时期的佛寺壁画及画家 / 073

五代前后蜀时期的佛寺壁画 / 073

成都大圣慈寺壁画 成都圣寿寺壁画 成都宝历寺壁画
成都净众寺壁画 成都应天寺壁画

五代前后蜀时期的佛寺壁画画家 / 078

房从真 宋 艺 张 玄 张景思 杜 颢 龟 赵德齐
高道兴 李 升 杜子瑰 杜敬安 张 玫 杜怀玉
董从诲 黄 筌 孔 嵩 蒲师训 赵德玄 赵忠义
阮知诲 丘文播 丘文晓 丘余庆 僧令宗 杜 措（一作楷）
杜宏义 僧惠坚 赵 才 景 朴 姜道隐 李文才
王继之

叁】 两宋时期的佛寺壁画及画家 / 094

两宋时期的佛寺壁画 / 094

成都大圣慈寺壁画 成都昭觉寺壁画 成都信相寺壁画
成都金绳院壁画 蓬溪定香寺壁画 简阳圣德寺壁画

两宋时期的佛寺壁画画家 / 100

黄居寀 石 恪 孙知微 成宗道兄弟 童仁益
赵元晟 鲁安道 僧延广 文 同 蒲永升 郭道卿
郭游卿 郝孝隆 童 祥 刘国用 程 堂 周 纯
王绍祖 刘 铨 李 蕃 杨 祁 李怀让 刘仲先
张希古 张希正 李时泽 僧道宏 僧智平 僧虚已
刘 涇 僧祖鉴 僧宗震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佛寺壁画 / 113

壹】 概 述 / 114

贰】 元明时期的佛寺壁画 / 123

元时期的佛寺壁画 / 123

阆中永安寺壁画

明时期的佛寺壁画 / 124

安县开禧寺壁画

遂宁广德寺壁画

蓬溪宝梵寺壁画

成都青白江明教寺壁画

邛崃盘陀寺壁画

剑阁觉苑寺壁画

平武报恩寺壁画

蒲江河沙寺壁画

成都新繁龙藏寺壁画

彭州涌华寺壁画

广汉龙居寺壁画

新津观音寺壁画

资中甘露寺壁画

天全大悲寺壁画

芦山白塔寺壁画

什邡慧剑寺壁画

邛崃石塔寺壁画

剑阁梵天院壁画

蓬溪定静寺壁画

第五章 清时期的佛寺壁画 / 163

壹】 概 述 / 164

贰】 清时期汉传佛寺壁画 / 167

成都文殊院壁画

三台尊胜寺壁画

内江圣水寺壁画

芦山白塔寺壁画

成都金华寺壁画

郫县石佛寺壁画

绵阳马鞍寺壁画

成都石经寺壁画

平昌北山寺壁画

成都新都宝光寺壁画

新津观音寺壁画

江油万寿寺壁画

达县真佛山德化寺壁画

合江法王寺壁画

蓬溪宝梵寺壁画

蓬溪鹫峰寺壁画

遂宁广德寺壁画

梁平双桂堂壁画

成都新繁龙藏寺壁画

罗江宝镜寺壁画

金堂慈云寺壁画

参】 四川地区藏传佛教及佛寺壁画 / 197

藏传佛教及其在四川藏区的传流和发展 / 197

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

藏传佛教在四川藏区的流传和发展

四川地区藏传佛寺壁画 / 200

康定塔公寺壁画	德格八邦寺壁画	德格印经院壁画
德格白垭寺壁画	德格岔岔寺壁画	德格竹庆寺壁画
色达拉则寺壁画	白玉噶拖寺壁画	炉霍寿灵寺壁画
道孚灵雀寺壁画	丹巴松安寺壁画	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壁画
若尔盖格尔底寺壁画	若尔盖苟象寺壁画	马尔康大藏寺壁画
马尔康草登寺壁画	马尔康西斯岗寺壁画	壤塘措尔基寺壁画
壤塘棒托寺壁画	理县喇嘛寺壁画	小金结斯喇嘛寺壁画

图版目录 / 218

主要参考书目 /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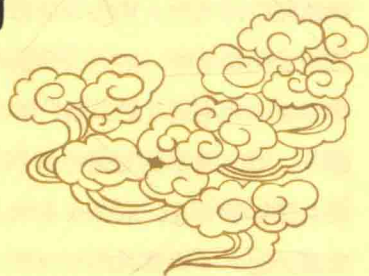
后 记 / 222



四川佛寺壁画艺术
Sichuan Fosi Bihua Yishu

第一章

佛教早期在四川地区的 传流及佛寺 壁画的出现





壹】概述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距今已经历了二千余年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虽然有过“三武一宗”灭法之灾^[1]，但始终未能遏止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和民众信仰中的传播。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习俗的会通融合中，不断地变化、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化的宗教，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直到近代的一些政治家，无不借用佛教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在中国民间，佛教关于“因果报应”等思想，更是深入人心，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传统道德行为的规范和保证。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数千卷佛教经典被翻译为汉字，在我国的诗歌、小说创作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风行各地的佛寺、佛塔，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民族风格；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的雕塑和壁画，更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北方陆路，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深入内地；一条是南方陆路，由古印度东部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再到四川；再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我国沿海，即通过海路路线传入我国内地。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2]以来，北方陆路便成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商业贸易、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又包括南北两道。南道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

[1] “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法”，指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灭法”，又称“法难”。

[2] 西域的名称始于汉代，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大部在我国今甘肃敦煌以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地区。

[3] 参阅刘鹏：《细说中国佛教》，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4] 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种族名，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佛”，佛陀的简称，即先觉者，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释迦牟尼，原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出生于古印度北部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家，属刹帝利种姓，母亲摩耶夫人，生下他七天后去世，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抚养成人。关于生卒年代有多种说法，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出律记”推断，为公元前565—前486年，约与中国孔子同时。幼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29岁（一说19岁）时有感于人生生、老、病、死等各种苦恼，以及对当时婆罗门教不满，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开始到摩揭陀国王舍城跟“数论”先驱阿罗迦迦罗摩和乌陀迦罗摩子学习禅定。后到尼连禅河附近树林中独修苦行六年。后又到菩提伽耶菩提树下静坐思维，最后达到觉悟。时年35岁（一说30岁）。先在波罗奈城鹿野苑向其侍从阿若骄陈如等五人说法，此后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进行

再到达疏勒（今喀什市一带）。东汉时来到中国内地的印度高僧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以这南北两道为通道的。以后，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现在学术界一般采信西汉汉安帝时传入说。据三国曹魏鱼豢撰《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从《魏略·西戎传》的介绍来看，《浮屠经》是讲释迦牟尼佛^[4]生平传说的经。大月氏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战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建立贵霜王朝，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古印度西北地区。此地及周围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信奉佛教，大月氏迁徙到原大夏所居地方之后，很快受到当地风俗影响也信奉佛教。从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西域的交通来看，《魏略·西戎传》所记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口授佛经的说法应是成立的。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首先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在民间流行才能立足。东汉时，皇室信奉黄老^[5]和神仙方术，佛教的教理因被视为“清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释迦牟尼佛被认为是大神，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被视作和祠祀相类似，因而佛教为帝王所崇尚。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6]汉桓帝也奉佛，在宫禁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像并列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佛典只有译成汉文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此时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一名安清，原为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国太子。他博学多才，广览佛经，曾游学西域各国，通晓各国语言，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不久学会汉语，即从事译经工作。到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年）他译出有《安般守意

传教，并组成适应传教的僧团，奠定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80岁时于拘尸那迦城逝世。起初，释迦牟尼被视作“先觉者”，尊之为“佛”，后逐渐被神化。记载其事迹的汉译佛典很多，如《过去现在因果经》《修行本起经》《瑞应本起经》《中本起经》《佛本行经》《普曜经》《佛本行集经》《佛所行经》《五分律·受戒犍度》《四分律·受戒犍度》，以及《释迦谱》《释迦氏谱》等；南传巴利文经典有《小部》等。

[5] 黄老，即黄帝、老子的合称。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在姬水生长成人，又以姬为姓。建国于有熊，所以称为有熊氏。当时天下炎帝衰，蚩尤暴虐，战乱不已，生灵涂炭。黄帝肩负安定大任，终擒蚩尤诛之，诸侯尊为天子，成为天下共主。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被誉为华夏“人文初祖”，后传他寻仙求道于崆峒山广成子。他采首山之铜在荆山之下铸成铜鼎，此鼎具灵气，能知凶吉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鼎铸成后，有黄龙自空而降迎接黄帝，黄帝即乘龙升天。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年），字伯阳，又称老聃，若县（今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

[6] 参阅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等大量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7]。另外,从大月氏来的支娄迦谶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若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并称汉代两大译师。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他们也各有传译。

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三国两晋时佛教开始流传开来。史载,魏明帝曹叡曾兴建佛寺,陈思王曹植也喜欢读佛经,吴国孙权曾建寺塔,号建初寺。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佛教信仰也渐渐流布到民间。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时以洛阳和长安两都为中心,修建佛寺一百八十所,有僧尼三千七百余人。这说明佛教在政治中心城市已经立足,并具有一定势力。此时,佛典翻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师增多,出现了支谦、竺兰护等著名译师。三国时译经还出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用道家^[8]术语来表述佛教的思想,体现了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的趋势。

到东晋十六国时,南北分立,但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生命难保的境遇也使广大老百姓希图从求神拜佛中解除苦难。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下层百姓的需要、向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精神土壤,使佛教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佛教僧侣学术论文的纷纷问世,般若学^[9]不同学派的竞相成立,民间佛教信仰者的剧增,这一切就促成中国佛教发展高潮的来临。

南北朝继东晋十六国的分立状态,又持续分裂了一百六七十年。这是佛教进一步流传发展的时代。

南朝历代皇帝大都重视提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原来崇信道教^[10],在即位的第三年即发愿舍道归佛,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并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然后再由群臣花重金把他奉赎回宫,以此自立功德,又充实了寺院经济。他还严格戒律,重视译经,并亲自讲经说法,

[7] 指佛教禅宗的经典。禅,这里指禅宗。禅宗是我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修习的全部内容而得名。还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本有之佛性为主旨,又名“佛心宗”。传为南朝宋末由古印度和尚菩提达摩传入我国,唐宋时极盛。

[8]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为主要代表,崇尚自然,但主张清静无为。

[9] 般若,佛语意为智慧。般若学,指对佛教《般若经》义理进行研究,并大力阐发《般若经》思想学说而形成的一个中国佛教学派。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高潮,并成为当时佛教的基础理论。

[10] 由东汉张道陵创立,到南北朝时期盛行起来。创立时,入道时须出五斗米,所以又叫“五斗米道”。道教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



图1 洛阳白马寺

著书立说。佛教依恃梁武帝专制主义皇权的支持和倡导，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

北朝大多数统治者也重视佛教。文成帝嗣位后，开凿云冈石窟，镌造佛像；孝文帝也广作佛事，大力提倡佛教；此后北魏的宣武帝、孝明帝也都积极奉佛。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朝野风从，至魏末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寺院三万有余。而且各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通过出租土地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此时，佛教可谓盛极一时。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后，统治者也大兴佛法，佛教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矛盾、相互吸引、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它本来的面貌，而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隋唐时期，进入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大成时期。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作为综合佛教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等为一体的佛教寺院，既是供奉佛的地方，也是僧众居住、生活和修持的地方，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是偶像崇拜、祭祀和佛教宣传弘法的基地，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作为佛寺壁画，它是绘画和

佛寺建筑结合的产物，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寺院就随之出现，而佛寺壁画也随之产生。

据考证，中国内地最早出现的佛教寺院是洛阳白马寺（图1）。据载，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遣使赴天竺^[11]求佛法。这些使者行至大月氏，遇到古印度的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一同来到中国内地传教。永平十年（67年），求法的一行人，用白马驮佛经、佛像，历经艰辛，带两位高僧到达洛阳。汉明帝很敬重两位高僧，亲自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安排在鸿胪寺居住、传经，并翻译佛典。鸿胪寺也因白马驮经而来，而被称为白马寺。鸿胪寺本来是掌管外交事务的官署，也就成为中国内地最早的寺院，“寺”也就成了佛教建筑的专门称呼。

关于佛教绘画及佛寺壁画的最早记载，也是在白马寺。据南齐王琰《冥祥记》说：“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众，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12]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开）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备载。”^[13]

自白马寺之后，洛阳佛教寺院汉末即有大规模的修建。据《道行经后记》《法苑珠林》《后汉书·释老志》等记载，洛阳城西有菩萨寺，城中则建有专供西域人参拜和居住的“官浮图精舍”^[14]周闾百间。“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15]依据洛阳建寺的史实推断，洛阳佛寺中已有佛像的绘塑供奉。像前面所提“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那样的壁画巨制，虽难以尽信，但都邑佛寺有佛教内容的壁画绘作应属必然。

到东汉末年开始出现规模宏大的佛寺。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东汉末年，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建浮图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似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

[11] 我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

[12] 沙门，出家佛教徒的总称。

[13] 参阅金维诺，罗世中：《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版。

[14] “浮图”即佛陀，简称佛。“精舍”系指出家人所住的处所，也是佛堂和寺院的别称。

[15] [16] 参阅金维诺，罗世中：《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版。